

# 簡論《聖教雜誌》的史學價值 暨徐宗澤之貢獻\*

劉志慶

---

[提 要] 民國年間,中國天主教刊物由少及多,到 20 世紀 30 年代,全國有天主教刊物 120 餘種。《聖教雜誌》是天主教刊物中的佼佼者,辦刊歷史長,學術影響大,是中國天主教的重要期刊之一。據統計,該刊 1912~1938 年連續出版 320 期,發表了大量教會史文章,是研究中國教會不可或缺的參考文獻。該刊“教中新聞”欄也有許多教會史資料,彌足珍貴,但因缺乏詳細而專業的整理,加之無法檢索,致使許多資料並未得到充分利用。

[關鍵詞] 《聖教雜誌》 史學價值 徐宗澤

[中圖分類號] B976.1; K25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088-11

---

《聖教雜誌》是中國天主教報刊中影響較大的刊物,創刊於民國元年,持續辦刊 27 年,因受抗戰影響而停刊。該刊主編徐宗澤是天主教南京代牧區(後為上海教區)的中國籍司鐸,青年時期留學海外,獲博士學位,一生以辦刊、著書為務,著述頗豐,其擔任《聖教雜誌》主編後,使該刊更加貼近現代社會,影響日趨擴大。<sup>①</sup>

## 一、《聖教雜誌》的歷史沿革

《聖教雜誌》的前身是 1879 年創刊的《益聞錄》,1907 年更名為《益聞格致匯報》,當年又更名為《時事科學匯報》,1908 年再度更名為《匯報》,1910 年停刊。<sup>②</sup>

《匯報》的停刊,令上海神長教友深感惋惜,“已有三十多年歷史之《匯報》,一旦停刊,實在可惜;又吾國當時天主教定期刊物,竟絕無僅有,不可不期望日後有一報紙,以聯絡教中之同志也。”<sup>③</sup> 1911 年,潘秋龍、張漁珊神父開始籌備創辦新刊物,並於當年印製樣刊一冊,分送各界,獲得教區長上同意,同時也得到全國許多神長支持,福建南境代牧區主教黎誠輝(Isidore Clemente Gutiérrez)欣然為《聖教雜誌》題詞;山西南境代牧區成玉堂神父也給予大力支持。1912 年 1 月 1 日《聖教雜誌》

---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天主教修會在華傳教史研究”(項目號:18BZJ032)的階段性成果。

正式創刊。其歷任主編為：潘秋麓、張漁珊(1912~1921年)；孔明道、張百祿、楊維時(1922~1923年)；楊維時、徐宗澤(1923~1924年)；徐宗澤(1924~1938年)。<sup>④</sup>

第一任主編潘谷聲，字秋麓，聖名若翰保弟斯大，江蘇青浦人，1867年生於上海，1879年秋在徐匯公學讀書，1884年入修道院，1888年加入耶穌會，1898年晉鐸，1902年任徐匯公學校長，兼《益聞錄》副主編，1904年辭去校長職，擔任《益聞錄》館政，1906年再次擔任徐匯公學校長。1908年擔任震旦大學副校長，兼任哲學教授。1911年重回徐家匯，主管《聖心報》。1912年創辦《聖教雜誌》，同時仍主編《聖心報》。1921年12月31日去世。<sup>⑤</sup>

副主編張璜，字漁珊，又字漁人，聖名瑪弟亞，1872年生於江蘇南通，幼年在徐匯公學肄業，1893年入徐家匯初學院，後加入耶穌會。1904年晉鐸，1909年任《聖心報》、《匯報》副主編，兼管藏書樓，1912年與潘秋麓共同創辦《聖教雜誌》，1921年調無錫傳教。1929年4月30日去世。<sup>⑥</sup>

1. 定位：《聖教雜誌》繼承《益聞錄》、《益聞格致匯報》、《時事科學匯報》、《匯報》，為中國天主教之機關報。<sup>⑦</sup>

2. 宗旨：本刊旨在護衛聖教道理，故討論教理、教道為多；討論之法，不祇在消極方面，積極方面之研究更為本社所注意；因此有許多論文，恐少華麗之語，新奇之想，然所言必切實、必穩妥、必負責，雅不欲炫異於人也。<sup>⑧</sup>

3. 職責：本刊旨在為同志服務，以盡榮主救靈之心，故論文務必為人有益，聖教之道理、純正之哲學、公普之科學，本誌無不研究及之；至於教史、益聞，足以增進知識者，更為注意焉。<sup>⑨</sup>

4. 簡章：《聖教雜誌》1912年創刊號上刊登該刊簡章，此後27年間除版面、定價有變化外，其他方面一以貫之。

一、本報定名《聖教雜誌》，專登教中信道、學說、事實，凡不涉教事者，概不採入。

一、每月一期，與《聖心報》同時出版，每期暫定十六張，俟銷數較旺再為擴充。

一、本報每年十二期，暫定大洋二角，郵費由中國郵局寄者，外加一角二分，由外國郵局寄者，加二角四分，如兼訂《聖心報》者郵費暫免。<sup>⑩</sup>

5. 欄目：《聖教雜誌》1912年創刊號上羅列了該刊主要欄目，30年代以後有一些增加，後文詳述。

一、諭旨。凡教皇上諭及羅馬各聖部文牘，擇要譯登。

二、論說。本館記者自著，俱係教友、社會有關係之文。

三、近事。凡各國教中大事及新聞等，俱入此類。

四、辨道。凡近人謬說，與信道及哲學背馳者，俱根據大道盡力駁斥，以挽狂瀾。

五、考據。凡屬聖教掌故，如《聖經》、聖道、禮節、經文等，俱溯源窮委，以饗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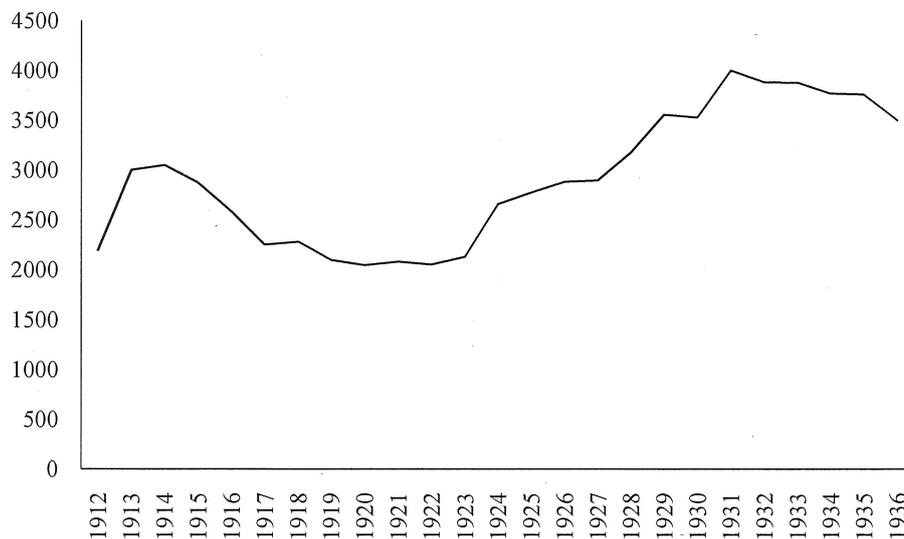
六、答問。凡問道及疑難之端，為之解惑析疑。

七、雜著。凡中西名人演說、傳記、文牘等與教務有關者，或譯或編，列入此門。

八、介紹。凡有教中聖書、新刊之本，為之批評，以貢獻於閱者。<sup>⑪</sup>

6. 版式：第1~6期為小版本，每期16頁；出版僅半年，即擴充為32頁。1912年第6期發布《聖教雜誌第二次擴充預告》云：“議定自陽曆明年正月，每期加增八張，連前足成四十張，……圖畫仍照前定，月印一張。”<sup>⑫</sup>從1913年第1期起，每期40頁，在封面之後增加插圖一張。<sup>⑬</sup>1913年12月，又發布擴版預告，“議定自民國三年陽曆正月，每期添印八張，連前共四十八張。”<sup>⑭</sup>從1914年第1期起，每期48頁，刊內有插圖，這一版式直到1930年第12期沒有大的變動。

7. 銷量：據統計，1912年《聖教雜誌》實銷數為2,200份，此後一直維持在三千份左右，訂數最低的是1920年的2,047份，最高的是1931年的4,001份。參見下圖：<sup>⑮</sup>



《聖教雜誌》1912~1936年銷售數量示意圖

《聖教雜誌》在教內影響較大，本篤會士陸徵祥曾評價說：“近讀《聖教雜誌》，各期內材料頗關重要……何論青年教友、司鐸，均應手執一冊而閱之，而轉展送閱，以廣流傳，而通聲氣。”<sup>⑯</sup>也有讀者評價：“《聖教雜誌》自清末迄今，廿五年中，孜孜兢兢，不遺餘力地，以宣傳真道發揚學術為己任，對於中華聖教先賢的文化遺產，尤更關心，竭力保存，盡量提倡；中華今日聖教能得豐滿的收穫，雖不可完全歸功於它，但真道佈傳得這樣地迅速，學術普及得這樣地廣遠，有賴於它宣傳鼓吹提倡的幫助的確不少，這是無可異議的。所以我說《聖教雜誌》的宣傳發揚精神，非但如明末清初的傳教士，惟以真道科學貢獻到中國來，而且是‘普遍全國，深入民間’。”<sup>⑰</sup>抗戰爆發後，物價飛漲，郵路受阻，《聖教雜誌》的發行受到極大影響。1938年1月，該刊發布啟事：“本誌自本期起，因戰事關係，紙料飛漲，減少八頁，日後戰事平息，再行恢復原有頁數。”<sup>⑱</sup>8月，又發布《聖教雜誌暫停啟事》曰：“今因戰事延長，自本期出版後，暫行停刊，戰事終止即能復刊。”<sup>⑲</sup>

## 二、《聖教雜誌》的史學價值

從史學研究角度而言，《聖教雜誌》為後世研究中國教會史保存了大量珍貴資料，有極高的史學價值。由於該刊紙本存世量小，雖有電子版但卻沒有比較專業詳細的目錄索引，查找史料較為困難，致使學人難以利用。近年來，筆者致力於編輯整理《聖教雜誌》全文目錄、分類及重要篇目數據庫。現從以下四方面略談該刊的史學價值：

### 1. 教會史資料

27年間，《聖教雜誌》在“正刊”欄共發表中國教會史論文100餘篇，為系統研究中國天主教提供了較為翔實的史料，重要文章篇目有：全國各教區簡史（11期連載）、天主教傳入中國至今之一瞥（3期連載）、中國教務紀略、清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雍乾嘉道時之天主教、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中國天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中國聖教史——自鴉片戰爭至今日、近十年來天主教在我國之狀況、二十四年份中國教務一覽表、近八十年來之江南傳教史（2期連載）、江蘇

省傳教史略、江西天主教傳教史(2期連載)、山西革命後南境教務情形、雲南教務、廣東天主教史、廣東革命後廉州教務情形、南京教區史略、河南北境傳教史、湖北襄陽屬教史記略、中華公教進行會之演進史、廣西省區修道院之歷史、羅明堅傳略、利公瑪竇小傳、郭公居靜小傳、潘國光傳、龍華民傳、南懷仁傳略、孫元化傳略、方望德司鐸小傳……

《聖教雜誌》保存了許多珍貴的教會史資料,如《劃分南京教區詔書》:

宗座以素具愛護中華高貴國家之摯情,故自始即籌劃在中國首都建立固定傳教區域,付諸本籍神職界管理,俾在其同胞中之傳教事業,得有更豐盛之收穫,而基多教會之普遍性,亦從而有新穎之佐證……朕每憶及此區,輒欲完成以上所云之事業……以宗座全權,將極廣袤之南京代牧區,劃分為二,其一包括江寧、高淳、江浦、句容、溧水、六合、丹徒、金壇、溧陽、丹陽、揚中、武進、宜興、江陰、無錫等十五縣,命名為南京代牧區,即以此區,委託本籍神職班管理,其主教座堂,宜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其餘各縣,則另成一新代牧區,名為上海區,仍交由耶穌會士管理;凡全球各教區神長,按照通例或合法習慣所應享之權利殊恩異典,該兩教區皆得享受,而其他各教區神長所應負之職務,朕亦同樣加諸該兩教區。……

一千九百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朕即位之十二年發自羅馬聖伯多祿大殿<sup>②</sup>

該諭令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中國最重要的教區之一、民國政府所在地——南京代牧區成為國籍教區是在1933年12月13日,管轄15縣,主教座堂定在民國首都南京。同時上海代牧區也成立於這個時間,其管轄區域是除上述15縣之外的原南京代牧區其它各縣。

“教中新聞”是《聖教雜誌》傳統欄目,特別是徐宗澤任主編後,精心組織該欄內容,擴大容量,刊發大量教會史資料,因這些資料大多由各教區提供,經過教區主教批准,所以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僅1931年第1期至1938年第8期,“教中新聞”刊登中國教會史及相關史料多達600餘條,長的達十數頁,短則數行,涉及新教區成立、新主教任命、主教去世、神父晉鐸、晉鐸銀慶金慶紀念、教區沿革、教堂建設、修院建設、修會發展、境外朝聖、駐華宗座代表活動、教務統計等教會活動的方方面面,信息涵蓋全國絕大部分教區,這些資料近世以來尚無人系統整理,學者只有零星使用。本文隨機開列若干資料條目:國籍五位聖方濟各會修士覲見教宗、羅馬祝聖中華三位新主教電播喜音、剛總主教講演公進會與傳教區、蔡總主教視察各地經過、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蒞洛陽祝聖巴代牧主教誌盛、于斌主教在南京就職盛典、山東兗州祝聖舒主教、山東周村主教在美祝聖、獻縣第一任國籍主教、沂州主教區新主教發表、建寧自治教區新區長發表、江西余江教區徐大司牧逝世、河南滑縣追悼孟司鐸略誌、國籍教區又新定多處、雲南昭通華籍新區教務一瞥、山西洪洞新教區、江蘇南通狼山聖母堂之原始、通遠坊聖心修道院新堂落成的盛況、甘肅蘭州代牧區主教座堂奠基紀念、蕪湖涇縣天主堂落成誌盛、方濟各聖院會在陝西安康傳教概略、巴黎外方傳教會之活動現狀、漢口市兩湖總修院主教會議之經過、吉林教區大修院一瞥、中華公教羅瑪朝聖團抵香港歡迎熱烈一斑、河南滑縣天主堂空前未有之集團領洗、甘肅鞏昌傳教之誌略、1933年之傳教事業、去年全國教務成績、中華全國各教區教務統計、1935年度全國公教教育統計、山東周村教區近況、全國公教進行會統計、唐江教區之傳教方針、中國朝聖團留羅瑪半月記……使用這些資料需要具備中國傳教區沿革知識,如果不按教區查閱,這些只是碎片化的資料,史料價值將無法充分體現出來。

1931~1938年另有以“掌故”、“補白”形式刊登資料90多條;利瑪竇始在北京建住屋、利瑪竇的貢品、南京的第一教友、李之藻的著述、許母徐太夫人、最初的國籍耶穌會修士、死在中國內地的

第一西士麥安東、嘉定會議、祭巾的來源、肇慶聖堂始末、韶州聖堂始末、南京聖堂的結果、嘉定開始傳教建堂、寧波及嘉定開教、南昌開教、山西開教之高一志、陝西山西開教、山東開教、湖北開教、上海開教、上海老天主堂的來歷、淮安開教、廣西聖教之傳入、海南開教、明末中國傳教區演進簡史、1640年之教務情形、明末各省之教友數。

## 2. 地方志資料

研究《聖教雜誌》、評價徐宗澤司鐸必須提及徐家匯藏書樓收集的地方志。1909年，張漁珊任《聖心報》、《匯報》副主編，兼藏書樓主任，任職13年間，“收買各直省府廳州縣志書甚多，現在書樓中有不少善本書及四部叢書，都是公購置的。”<sup>21</sup>由此可知，徐家匯藏書樓的地方志收集肇始於20世紀初，最初可能只是張漁珊神父個人的收藏愛好。1923年，徐宗澤接任藏書樓主任，對張漁珊司鐸收集的地方志進行統計整理，並繼續收集，日積月累，到1931年已有一千餘部。

《聖教雜誌》1931年第3期刊登《請諸君熱心代收志書》：“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歷有年，惟所缺尚多。今開列所缺書名如下，請閱報諸君，代為蒐集。如蒙覓得，請將書名及價值先開單見示，以便查照，而免重複。不勝感激之至。”<sup>22</sup>並開列徐家匯藏書樓所缺的府州廳縣志書清單，筆者統計共缺志書223種，各省具體如下：盛京53種、吉林39種、直隸25種、江蘇9種、安徽25種、山東8種、山西16種、河南8種、陝西16種、甘肅24種。這是筆者查閱到的《聖教雜誌》公開徵集全國地方志的第一則廣告。

在《聖教雜誌》1931年第4期上，又發布有《收買志書通啟》：“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志書，已得千數百部，惟所缺尚多。對於東三省、新疆、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省，尤屬寥寥無幾，各省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蒐，不勝感激。若得此種志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月及書價，開單見示，書無新舊，但與敝處所藏不相重複者，即當通函商購。”<sup>23</sup>這則廣告成為其後歷年各期發布收買志書廣告的模板，直至1938年停刊，幾乎每期都刊登該廣告，及時向讀者報告收集到的志書數量，刊出相關省所缺志書清單。

1931年第3期、第4期的兩則廣告，標誌著徐家匯藏書樓收集志書工作由個人收藏行為轉變成為聖教雜誌社的一份工作職責。

徐宗澤充分發揮神長教友遍佈全國各地的優勢，呼籲各教區神父幫助收集地方志，他說，“全國傳教士有三千數百位，分佈於各省各縣各地，就是窮鄉僻巷，也有傳教士的蹤跡；所以要採訪蒐集，不是難事。”<sup>24</sup>在其大力推動下，收集志書工作成效顯著，據統計，1931年4月徐家匯藏書樓收藏志書還沒有確切數字，只是籠統說千數百部，1932年開始有準確統計。透過各期《聖教雜誌》上的《收買志書通啟》可以梳理出如下一組數字：1932年2月1,700部，1933年2月1,800部，1933年8月2,000部，1935年7月2,200部，1936年10月2,300部，1937年5月2,400部，1937年8月2,500部，此後可能是受到抗日戰爭的影響，該項工作沒有進展，到1938年7月仍然是2,500多部。<sup>25</sup>

方豪曾評價說，“我國收藏方志，日後雖以國立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等處為多，但在清末民初時，徐家匯藏書樓居首位。”1957年《徐家匯藏書樓所藏地方志目錄初稿》（油印本）統計有2,732種。<sup>26</sup>1936年5月6日，徐宗澤曾向上海《大公報》記者介紹，徐家匯藏書樓的志書有2,400多種，其中包括各省縣及鄉土方志，居全國圖書館第三位。<sup>27</sup>

## 3. 專刊資料

《聖教雜誌》出版的專刊均為同一或同類事件的資料彙編，其史學價值不言而喻：

一是“中華全國主教公會會議專號”，《聖教雜誌》1924年第7期，共70頁，為紀念在上海召開的

中國第一次主教公會議而編印。其序言曰：“維民國十有三年五月十五日，宗座欽使剛總主教，向銜教皇命，召集中華全國主教開公會議於上海，梯山航海，群萃一堂，實開中國傳教以來未有之盛舉，……剛欽使暨全國主教司鐸，擘畫經營，虛心討論，必與中國教務有絕大之良果……”<sup>28</sup>該專刊主要內容有：(1)公文：教宗庇護第十一頒賜駐華宗座代表剛總主教敕書、剛欽使以宗座名義召集公會議通知書、剛欽使致教皇公電；(2)社論：宗座欽使剛總主教與中國公會議、中國之公會議；(3)組織：公會議之組織、列席公會議之主教監牧司鐸姓氏表、委員會名單、職員之任務與姓氏表；(4)紀事：歡迎剛欽使到滬盛況、中國公會議開幕盛禮、徐匯公學校友會歡迎剛欽使及主教司鐸、剛欽使駕臨震旦大學、追悼已亡主教追思大禮彌撒、苦修院汪院長之教皇談、上海教友歡迎剛欽使、中國公會議閉幕盛禮；(5)訓辭：剛欽使公會議開幕大禮日之訓辭、眾主教追悼在華已亡主教日趙主教演講、剛欽使公會議閉幕大禮日之訓辭。

二是“教育專刊”，《聖教雜誌》1926年第6期，共110頁。其發刊辭曰：“今之留心教務者，莫不知教育之緊要；顧知其緊要，而不急起力行，知與不知，猶百步之與五十步耳。夫提倡教育，興辦學校，培植教中之人才，是在實力家；以言論鼓吹，喚醒當局之注意，實行其所當為者，報章亦肩其一部分之責任；此本社教育專刊之所由來也。”<sup>29</sup>該專刊主要內容有：(1)教育之原則：何謂教育、教育之原理、家庭與教育、國家與教育、聖教會與教育、聖教會教育之緊要、歷史上之聖教學校概觀、歷史上之聖教教育精神；(2)幾個教育問題：推廣教中學校、編輯教科書問題、師資問題、組織教育機關問題、學校註冊問題、新舊學制之去取問題；(3)幾個學校問題：國語問題、外國語問題、宗教科問題、訓育問題；(4)現代教育趨勢之評議。

三是“教務統計”專刊暨“當今教宗晉鐸五旬金慶紀念專號”，《聖教雜誌》1929年第7期，共81頁。卷首語總結編印該專號的四層意義：使全國教友洞知各區教務情形，發生輔助神長傳教之心；使按表比較各區傳教事業，而興奮發則效之心；使詳見教士等，一年中如何熱心榮主，而生觀感之心；使為父母者，有動於中培植兒女聖召之心。<sup>30</sup>主要篇目有：全國主教暨監牧、全國主教暨監牧之履歷、全國之司鐸及修士、全國傳教司鐸及修士表、修道院概論、全國修院修士表、中國教士暨信友表、教務成績緒論、致命血教友種、教務成績表、公教教育、學校學生表、論推廣慈善事業、慈善事業表、他項慈善公益事業、全國教務總表。其資料來源為馬德賚司鐸編纂、土山灣印製的 *Missions, Séminaires, Écoles catholiques en Chine*，該書資料由全國各教區長上批准提供，故可信度較高。

四是“徐上海特刊”，《聖教雜誌》1933年第11期，共101頁，為紀念徐光啟逝世300週年而編印，主要文章篇目有：惠主教讚徐文定公誥、陸徵祥為徐文定公列品事上安國孫主教書、奉教閣老的傳略、奉教閣老與聖教、奉教閣老與家庭（附徐上海軼事）、奉教閣老與民族、奉教閣老之政治經濟、徐光啟與利瑪竇、奉教閣老與科學、徐閣老的舊宅——九間樓、現代中國文化之前驅徐光啟、利瑪竇以學問為傳教之法、徐文定公的《農政全書》、奉教閣老的著作、閣老奉教著作的存軼、徐文定公軼事、徐文定公的子和孫男孫女、徐文定公遺跡——第宅、園林、墳墓、宗祠、閣老坊。

五是“五五週年紀念專刊”，1936年第12期，共88頁，為紀念《聖教雜誌》面世25週年、《益聞報》創辦55週年而編印。重要的文章有徐宗澤著《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全面回顧總結《聖教雜誌》25年的辦刊歷史，追溯到55年前的《益聞錄》；《二十五年聖教雜誌分類索引》為後人使用《聖教雜誌》提供了方便；《匯報、聖教雜誌歷年實銷數》留下了珍貴的營銷記錄。此外，還有李問漁、潘秋龍、張漁珊傳記，主教、教友等讀者的感言和祝賀等文章。

六是“吳漁山晉鐸紀念專刊”，《聖教雜誌》1937年第8期，共64頁，為紀念吳漁山晉鐸250週

年而編印。主要文章有：首先表揚吳漁山神父的是李問漁神父，故李問漁的《吳漁山先生行狀》列為首篇；其次是《墨井道人晉鐸二百五十年之紀念》，研究他的生平、晉鐸地、晉鐸時的情形；《吳漁山之皈依天主教》討論了其進教動機、受洗時間、從何人手受洗、當時常熟的傳教情形等；《關於吳漁山司鐸之幾個小問題》研究其是否為言子後裔、為何吳漁山號墨井道人、安葬地——上海聖墓堂的歷史；《訪墨井記》是一篇實地調查文章，記述言氏後裔對吳漁山的回憶；李問漁曾輯《墨井集》，收集吳漁山的詩文甚多，其遺漏的《墨井道人三餘集》在此專刊發表；《話墨井詩》是一篇文學作品；吳漁山加入耶穌會後，曾在澳門居住六、七年之久，故有《墨井道人修道地——澳門》一文。<sup>③</sup>

#### 4. 通諭及中外大事表

“通諭”類資料主要是教宗通諭、教宗重要演講詞、公函以及少量駐華宗座代表文告。據統計，這類資料主要有：新教皇本篤十五勸告和平之諭（1914年第12期）、教皇諭葡京主教（庇護第十世）（1914年第3期）、教皇本篤十五宣佈普世之諭（1915年第3期）、教皇本篤十五於歐戰第四年之初勸告交戰國元首籌備釋怨媾和之諭（1917年第12期）、聖職部諮照普世主教注意非公教團體若干反對信德新運動之公函（1921年第4期）、教皇庇護第十一欽定聖母及聖女若翰納達爾格為法國主保恩諭（1922年第7期）、准定小德肋撒列品聖跡時教皇庇護第十一之演說詞（1923年第10期）、教宗庇護第十一建立駐華欽使諭（1923年第2期）、教皇庇護十一即位後宣佈志願詔（1923年第6期）、教皇庇護第十一去歲十二月初旬御前會議之演說詞（1923年第9期）、庇護第十一擴充傳教事業通牒（1928年第10~12期連載）、教宗良第十三勞工通牒譯稿（1928年第2~9期連載）、教宗本篤十五世擴充傳教事務之通牒補錄（1929年第2~4期連載）、駐華宗座代表剛恒毅總主教致中國各區代權主教及其屬下司鐸公函補錄（1929年第5期）、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講避靜的益處要緊推廣的通牒（*Mens Nostra*，1930年第5~6期連載）、當今教宗庇護第十一論婚姻通牒（1931年第5~6期連載）、教宗庇護十一世“真實之光”*Lux Veritatis*之通牒提要（1932年第4期）、教皇庇護十一世論公教司鐸通牒撮要（1937年第1期）……

這些資料的原始文本為拉丁文，發表時均由精通拉丁文的神職翻譯為中文，相對比較準確，可信度較高，是研究中國教會史特別是天主教本土化方面的重要參考文獻。

“中外大事表”欄目，從《聖教雜誌》創刊時即以有之，1925年徐宗澤任主編後，對該欄目進行改革，“易以稍有系統之時事記述，似更有趣味。”<sup>④</sup>每期之後均刊登“中外大事表”，各期時間首尾貫之，基本上每期保持2頁，“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為憑”，每期之後均有教區主教准字樣。這些資料對研究中國教會發展的背景、時政有一定參考價值。

### 三、徐宗澤司鐸的貢獻

筆者認為，《聖教雜誌》注重教會史、注重學術性，與其主編徐宗澤是有密切關係的。徐宗澤（1886~1947），字潤農，洗名若瑟，耶穌會士。1886年3月7日出生於江蘇省青浦縣蟠龍鎮。為徐光啟第十二代孫。父名徐清望。1905年參加童子試，中邑庠生（秀才）。同年，清政府廢除科舉考試，徐宗澤旋入徐匯公學。1907年入徐家匯耶穌會初學院，1909年入耶穌會。1910~1911年，在英國坎特伯雷學習修辭學一年，1911年在英國澤西島（*Insula Caesarea*）學習哲學。1914年回上海在徐匯公學任教。1917~191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學習神學，1919年在英國海斯廷斯（*Hastings*）學習神學。1921年8月24日在海斯廷斯晉鐸，同年獲神學博士學位。1922~1923年在浦東南匯縣傳教，1923~1928年在徐家匯依納爵公學教授中文。1923年任徐家匯藏書樓主任，並與楊維時神

父共同擔任《聖教雜誌》主編，1924年起獨任主編。<sup>③</sup>

徐宗澤司鐸學識淵博，著述甚豐，對神學、哲學、宗教學、歷史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都有涉獵。在《聖教雜誌》上發表有關神學、哲學、教會史文章多篇，後來有些文章經修改補充結集成書，在土山灣印書館出版20餘種，主要有：1926年的《婦女問題》、《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共產主義駁論》，1927年的《探原課本》，1928年的《哲學史綱》、《社會問題》、《社會主義鳥瞰》，1930年的《心理學概論》、《聖寵論》、《天主造物論·四末論》，1931年的《聖事論》、《信望愛三德論》、《婦女問題雜評》，1932年的《天主降生救贖論》，1934年的《徐文定逝世三百年紀念文彙編》、《教育原理》，1938年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1939年的《宗教研究概論》、《天主教之戰爭觀》、《倫理答疑》，1940年的《高中教理課程答解》，1949年的《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等。

1947年6月20日，徐宗澤因斑疹傷寒去世，時年61歲。7月10日，上海天主教各團體假座徐家匯天主堂，邀請教內外人士舉行追悼大會。7月20日，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在南京太平巷舉行追悼，南京《益世報》出版悼念特刊。

徐宗澤主編《聖教雜誌》期間，他的“兩個堅持”鑄造了該刊特色，保存了珍貴的史料：

其一，堅持學術性。徐宗澤認為，“學術為傳教之一種工具，明末清初傳教士之來吾國開教，其成功之點，要以學術為之先容，及得到士大夫之好感及信仰，開教之障礙，已排除多多矣；於是在積極方面，開始工作而事有易為者矣。”天主教早期在中國各地開教如此，而當今的傳教亦無不如此。所以，他提出要“一面注重吾國公教先賢之文化事業，盡量闡揚，俾吾後人知所景仰而仿效；一方面亦提倡公教文化，使吾公教同志中多出人才，研究文化，幫助傳教。”<sup>④</sup>在此思想指導下，《聖教雜誌》發表的許多文章都具有研究性質，“辯護教理教道，提倡哲學神學、現代的思潮，近今的一切主義、學說，與夫聖教的文化、歷史，凡足以增進吾人之學問者，無不討論及之。”<sup>⑤</sup>20世紀30年代，有人對中華公教出版刊物進行過調查，其報告顯示，《聖教雜誌》在月刊中“首推年齡最長”，“於中華學術方面，宣道方面，都承認它佔有極高的地位。”<sup>⑥</sup>

當時，讀者評判一本刊物常將其分為兩種，即“硬性讀物”與“軟性讀物”。前者大凡指學術性強、流行受限的刊物，後者指迎合大眾口味的通俗讀物。用今天的話講，《聖教雜誌》走的是學術刊物之路，在近代國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情況下，這也注定了該刊的訂戶會受到很大限制，既然看不懂，乾脆就不去訂閱。在“軟”“硬”之間是否改變，取決於刊物的宗旨和性質，徐宗澤及其同仁也深知這是困擾刊物發展的主要問題，但是為了堅持《聖教雜誌》的辦刊宗旨，保持其學術性，仍然堅持走“硬性”路線。他說，“本誌上的言論，人們謂太多硬性；所以有許多人念了不易消化。這個批評，不能不加以辯護。本誌不是一種消遣的刊物，也不是要迎合人們的心理，而以營業為目的的讀品。但是要以真理真道，給人們知識的糧食。我們知識的糧食是很要緊的。因為明悟的食品多滋養料，那末，人之明悟健全，而有正確的知識；反是，人的明悟必將傷害，而生出許多錯誤的知識。你想，軟性刊物是明悟的好食品嗎？且現代的青年，多成為女子化，軟性的刊物也當負著一部分的責任。”<sup>⑦</sup>“人們都說《聖教雜誌》上的論文，太多硬性，所以不受人們的歡迎。但是我們該當知道，硬性讀物是培植人們的判斷、推理，有極大的效驗；人們讀慣了這類的刊物，意志自然成了卓絕。至於軟性讀物，易使人們氣靡志怠，青年染了這種毛病，將少果敢之氣概了！”<sup>⑧</sup>

其二，堅持刊物導向。《聖教雜誌》刊發的許多文章都體現了愛教宗、愛國家的思想。

從擁護教宗而言，前已有述，《聖教雜誌》先後刊登教宗通諭、訓詞多篇，翻譯精準，篇幅巨大，及時刊發教宗最新訓令，對中國教會有很好的指導作用。“如本篤第十五世、庇護第十一世之兩傳

教通牒，可謂在中國傳教史上劃時代之重要文件，本誌特公佈刊登，用宣綸音。”1928年8月，教宗獲悉中國南北統一，“特發通電，表示欣慰，並切望列強認可中華國民應有之希望與權利。”<sup>39</sup>這些文章體現出《聖教雜誌》作為中國教會重要期刊的一種責任擔當。

熱愛祖國是教友的天職。《聖教雜誌》認為，“政府者代表天主以管治人民者也，共統權受自天主，故有尊敬之必要。”“愛國為人民之本分猶子女之不能不愛家庭。凡生為中國之人該當愛中國，而教友之愛國更當超出一般民眾，雖教友表示愛國之方式不同，而愛國之精神則一致也。”“教友者有二重的責任，一是愛國，一是愛教；愛國不當與愛教之本分有抵觸，一有抵觸，即非真愛國，真愛教。蓋一教友不依據愛教之本分而言愛國者，非真愛國者也；一真愛教之教友，亦未有不愛國者也。”<sup>40</sup>《聖教雜誌》還摘引上海教區惠濟良（Auguste Haouisée）主教的牧函，指出：“我們是公教教友，所以我們的愛國心，當超過任何國民；我們的公教正因為是天主的，所以對於天主分給我們各人的一部分世界——就是我們的國家——不能漠不關心的，國家是列祖列宗的遺產，是生我養我的母親，我們有義務效忠國家。”<sup>41</sup>愛國愛教是《聖教雜誌》始終堅持的方針。

在刊發與愛國相關的文章時，《聖教雜誌》的做法值得肯定。例如，日本侵略中國在東北扶持“滿洲國”時，徐宗澤等人和絕大多數中國神職一樣堅定地站在中國政府一邊，闡明教會立場，譴責日本侵略。周浚良《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有一段內容涉及“滿洲國”問題，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中國教會是不承認“滿洲國”的。文曰：

在錦繡河山的中華民國地圖上，一條虛點線把東三省和我們隔開了，另外寫上“Manciuria”滿洲，而參觀指南上，更寫明“中國與滿洲里亞”“Cina e Manciuria”。其實沒有寫“滿洲國”，而寫“滿洲里亞”已是他們的一番苦心了；外國的報紙，沒有一份不寫“滿洲國”的，似乎事實上已承認它的存在。在中國報紙上，寫“滿洲國”加上一個括弧；那末，這兒的虛點線，並不比括弧認真，因為還有粗大的深色國界線，把東三省統統包括在內呢！<sup>42</sup>

面對日本的侵略，原民國高官後加入本篤會的陸徵祥神父義憤填膺，寫下批判日本侵略、維護國家統一的萬字長文——《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滿洲國”》，全文29頁，是筆者目前看到的該刊最長的文章。此文先回顧自1894年起日本侵略中國的種種惡行，其後大篇幅摘錄比利時梅西愛樞機在他的國家被佔領時期所發表的言論和態度，並以教會道理批判日本的侵略行徑，文末引用1928年8月1日教宗庇護十一世承認中國國民政府的“八一通電”內容，說教宗“完全信得過這樣一個在人數上是全地球最大的國家，一個識得大體和光輝素著的古文明國，所有正當願望和一切主權該完全予以承認。”<sup>43</sup>

## 餘 論

從今天學界的視角看，《聖教雜誌》在近代中國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期刊；從教界而言，該刊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公教122種（有說150種）刊物之一，無論其辦刊歷史、學術影響都是首屈一指的。但僅從銷量而言，《聖教雜誌》與同時代的天津《益世報》3萬份、北平《益世報》15,000份相比，相差甚多，這自然也意味著其在全國的影響要打折扣。1936年5月在羅馬舉辦“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親臨會場的周浚良參觀到中國的主展室（第47室）時，發出驚歎，“最使我驚異的，不見《聖教雜誌》，細細地來回找了兩次，千真萬確的沒有。雖然我的眼光不甚高明，但是玻璃櫃內的冊子，如此簡單地平鋪著，竟是不能有錯漏的可能性。……第六十室耶穌會，……在這裡，我找到了《聖教雜誌》，是本年的第一期。……中國陳列室為會場之主要部分，修會僅附屬性質耳，捨本逐末，莫明

其故。”<sup>44</sup>由此，我們從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到，《聖教雜誌》在當時對教會高層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教內學者曾批評公教刊物的一些弊端，其中談到，“有幾種雜誌，編者人數太少，內容自難豐富。編者雖然有時會換上幾個筆名，但看看文字筆法，就可以看出只有他一人在牽線；試想一人的精力有限，如此一月二月尚可安度，但一年二年之後，自然腦汁絞盡而刊物陷於停頓。即幸而不停頓，也難弄出好東西。”<sup>45</sup>雖然，作者沒有點《聖教雜誌》的名，但筆者以為是包括該刊的，該刊最高銷數是 4,001 份，自養的難度比較大，雜誌社人手不足，主編徐宗澤在教會還有多個兼職。查閱該刊目錄，徐宗澤至少使用了 3 種署名：徐宗澤、宗澤、澤，另外許多文章沒有署名，也可視為出自主筆之手。最為典型的例子是，1926 年第 6 期的“教育專刊”、1933 年第 11 期的“徐上海特刊”，其中絕大部分文章作者都是徐宗澤，甚至可以理解為這是他個人的文章彙編。通覽 1925~1938 年《聖教雜誌》各期，讀者很容易發現這一現象，這的確是該刊的一個大問題。

當然，筆者無意過分批評才能出眾、聰明勤奮的徐宗澤博士，客觀條件限制了這位才子司鐸的發揮。方豪曾在《我懷念徐潤農神父》一文中說，“他的著作環境實在太壞了！差不多外國教士，能著作的，都沒有雜務；中國神父就不然：即以徐神父而言，他在最忙的時候，曾身兼六職，而且都是極碎的事務，叫他怎麼能細心研究？可是雜誌的篇幅不能不填滿，書籍也真缺乏，不能不應急需，於是乎一切筆記、札記都編譯成書。”<sup>46</sup>有方豪神父這個解釋，我們還怎麼能不理解徐宗澤神父呢？

1945 年抗戰勝利後，徐宗澤有兩大願望，“一為將藏書樓改為現代化圖書館，公諸社會；二為恢復《聖教雜誌》，均未獲得教會支持，徐神父修養甚高，迄無怨言。”<sup>47</sup>在抗戰時期，同為上海教區主辦的刊物之一——《聖心報》並沒有停刊，而且一直堅持到 1949 年。但學術性較強的《聖教雜誌》在 1938 年被教區高層要求停刊，抗戰勝利後也未能復刊，這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由外籍耶穌會傳教士任長上的上海教區對該刊的重視程度是不夠的，《聖心報》、《聖教雜誌》孰輕孰重一目了然。另外，1947 年 5 月 17 日，在上海舉行中國天主教出版會議，方豪神父向主辦會議的比利時籍高樂康神父建議邀請徐宗澤神父出席，並向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提出同樣建議，但最終徐宗澤並未獲得邀請。<sup>48</sup>是因為徐宗澤神父的身體原因還是其他原因，筆者目前沒有看到更多的資料。《聖教雜誌》以及徐宗澤神父在教會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鬱鬱寡歡的徐宗澤神父也正是在這一年 6 月 20 日去世，與此是否有關，筆者不敢妄自揣測。

①劉國鵬在 2015 年商務印書館新翻印的徐宗澤原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中，編撰有《徐宗澤先生學術年表》。張士偉《徐宗澤與〈聖教雜誌〉》（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8 年第 3 期）評析了徐宗澤對《聖教雜誌》內容和形式進行的四次大調整，以及他關心社會問題和國家命運等內容。相關論文還有：賴品超、李麗麗《萬民和平與抗日戰爭——徐宗澤對公義戰爭觀的“中國化”詮釋》（北京：《基督宗教研究》，2011 年），李麗麗《徐宗澤的天主教救國神學與“本地化”探索》（北京：《基督教文化學刊》，2010 年第 2 期）、《徐宗澤的天主教救國思想》（瀋陽：《理論界》，2010 年第 1 期），王新環《傳教士徐宗

澤與地方志》（哈爾濱：《黑龍江史志》，2013 年第 19 期），張士偉《〈聖教雜誌〉與近代中國社會問題》（黑龍江佳木斯：《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 年第 6 期）、《中國天主教界對“一戰”的思考——以〈聖教雜誌〉為視角》（重慶：《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17 年第 4 期）、《談〈聖教雜誌〉的抗日救國宣傳》（江西宜春：《宜春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0 期），張士偉、楊磊《徐宗澤與抗日戰爭》（陝西安康：《安康學院學報》，2018 年第 2 期）等，另有楊瑞《〈聖教雜誌〉與民國時期的天主教（1912-1938）》（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12 年）、周明明《〈聖教雜誌〉視野下的上海天主教學校（1912-193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2013

年)、劉鵬娜《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知識人的國家觀——以〈聖教雜誌〉(1923-1938)為中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18年)等碩士學位論文。

②③上海:《聖教雜誌》,1925年第1期。

③徐宗澤:《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

④⑧⑨⑬⑰⑳㉑㉒㉓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

⑤徐宗澤:《創辦本誌的潘秋麓司鐸》,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

⑥徐宗澤:《前本誌副主任張漁珊司鐸》,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

⑦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4期,扉頁。關於《聖教雜誌》能否定位為“中國天主教之機關報”,筆者存疑,以後可以專文討論。有學者認為《聖教雜誌》是“上海耶穌會機關報”(見徐文華《徐宗澤與〈聖教雜誌〉研究》,澳門:《文化雜誌》中文版,第63期,2007年夏季刊),筆者以為似不妥。

⑩⑪上海:《聖教雜誌》,1912年第1期。

⑫上海:《聖教雜誌》,1912年第6期。

⑬上海:《聖教雜誌》,1913年第12期。

⑭根據《聖教雜誌歷年實銷數》(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製作。

⑮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8期。

⑯⑰消迷:《聖教雜誌五五週年回顧》,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

⑱上海:《聖教雜誌》,1938年第1期。

⑲上海:《聖教雜誌》,1938年第8期。

⑳《劃分南京教區詔書》,牛若望司鐸譯,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1期。

㉑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3期。

㉒上海:《聖教雜誌》,1931年第4期。

㉓徐宗澤:《公教教士當怎樣注意中國地方志》,上海:《聖教雜誌》,1933年第8期。

㉔根據1931~1938年《聖教雜誌》相關各期上“收買

志書通啟”統計。

㉕④⑦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海: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2003年,第702頁;第703頁。

㉖《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參觀記》,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6期。

㉗《公會議專號敘言》,上海:《聖教雜誌》,1924年第7期。

㉘《教育專刊發刊辭》,上海:《聖教雜誌》,1926年第6期。

㉙上海:《聖教雜誌》,1929年第7期。

㉚上海:《聖教雜誌》,1937年第8期。

㉛劉國鵬:《徐宗澤先生學術年表》,見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252~255頁。

㉜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期。

㉝上海:《聖教雜誌》,1932年第9期。

㉞上海:《聖教雜誌》,1934年第11期。

㉟徐宗澤:《二十五年來本誌在思想界上之威權》,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2期。

㊱上海:《聖教雜誌》,1937年第11期。

㊲④④周浚良:《世界公教出版物展覽會巡禮》,上海:《聖教雜誌》,1936年第11期。

㊳陸微祥:《在天主教道理下評判“滿洲國”》,上海:《聖教雜誌》,1934年第4期。

㊴陳秋棠:《因聖心報徵文引起的一點小感想》,上海:《聖心報》,1937年第1期。

㊵④④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台北:學生書局,1969年,第2572~2573頁。

作者簡介:劉志慶,安陽師範學院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歷史與文博學院教授,河南省宗教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河南安陽 455000

[責任編輯 陳志雄]